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1.1 问题的由来	1
1.1.1 同声传译简介	1
1.1.2 同声传译研究概述	4
1.1.3 同声传译译语内容对应评估方法与不足	10
1.1.4 小结	21
1.2 研究的总体介绍	22
1.2.1 研究对象、范围	22
1.2.2 研究问题	24
1.2.3 研究价值	26
1.2.4 研究体系	27
第二章 同声传译信息分析体系的建立	29
2.1 理论框架	29
2.1.1 信息、信息论与信息科学	29
2.1.2 语言与信息	32
2.1.3 信息结构	34
2.1.4 小结	46
2.2 同声传译信息分析体系	47
2.2.1 源语信息衡量体系	47
2.2.2 译语信息损耗评估体系	56
2.2.3 小结	66
第三章 信息损耗描述性研究	69
3.1 英汉同声传译平行语料库建设	69
3.1.1 语料选取	69

3.1.2	语料转写.....	74
3.1.3	语料描述.....	77
3.1.4	语料标注.....	79
3.2	信息损耗统计与发现.....	96
3.2.1	统计数据.....	96
3.2.2	发现.....	111
第四章	信息损耗原因机制解释性研究.....	114
4.1	分析设计.....	114
4.1.1	分析维度.....	114
4.1.2	分析方法.....	116
4.1.3	分析框架.....	117
4.2	语料量化分析.....	128
4.2.1	源语变量水平标注.....	129
4.2.2	从信息损耗看源语变量水平.....	132
4.2.3	从源语变量水平看信息损耗.....	143
4.2.4	场景变量与信息损耗.....	147
4.2.5	小结.....	149
4.3	语料质性分析.....	150
4.3.1	命题信息损耗.....	151
4.3.2	信息成分损耗.....	173
4.3.3	小结.....	184
4.4	语料现场分析与译员访谈.....	187
4.4.1	研究设计.....	187
4.4.2	案例简介及标注语料.....	188
4.4.3	访谈分析.....	194
4.4.4	小结.....	199

4.5 发现与讨论	202
4.5.1 发现	202
4.5.2 讨论	204
第五章 结 论	209
5.1 研究发现	209
5.2 研究贡献与意义	211
5.3 研究不足与展望	214
参考文献	217
附 录	242
附录 1 源语标注语篇样例 (S6)	242
附录 2 译语标注语篇样例 (S10)	245
附录 3 译员回溯性访谈文字记录样例 (案例 2)	250
索引	256

图 目

图 1.1	研究体系.....	28
图 2.1	同声传译信息分析体系.....	67
图 3.1	标注编码文件.....	82
图 3.2	标注工具界面.....	82
图 3.3	标注界面.....	83
图 3.4	所有损耗数据检索展示.....	97
图 3.5	所有焦点性词汇级损耗数据的检索展示.....	97
图 4.1	同声传译信息损耗原因和机制分析的认知科学分析框架.....	127

表 目

表 2.1	信息损耗标注类型示例	65
表 3.1	语料描述	78
表 3.2	命题信息损耗总体数据 (1)	98
表 3.3	命题信息损耗总体数据 (2)	98
表 3.4	信息成分损耗总体数据	99
表 3.5	焦点性信息成分损耗总体数据	99
表 3.6	非焦点性信息成分损耗总体数据	99
表 3.7	总体信息损耗总体数据	100
表 3.8	T 断言总体未译总体数据	101
表 3.9	T 断言总体错译总体数据	101
表 3.10	T 断言总体偏译总体数据	101
表 3.11	各语篇信息损耗频次	102
表 3.12	各语篇命题信息损耗数据	103
表 3.13	各语篇 T 断言信息成分损耗数据	104
表 3.14	各语篇 T 断言总损耗率	105
表 3.15	各语篇 T 断言信息损耗率排序	106
表 3.16	各语篇 T 断言总未译率	107
表 3.17	各语篇 T 断言总错译率	108
表 3.18	各语篇 T 断言总偏译率	109
表 3.19	各语篇 T 断言命题及总严重未译率、错译率、 偏译率排序	109
表 4.1	口音水平	130
表 4.2	专业性水平	131
表 4.3	语速水平	131
表 4.4	信息密度水平	131

表 4.5	语言复杂度水平	132
表 4.6	命题未译率较高语篇的高水平变量	133
表 4.7	命题错译率较高语篇的高水平变量	133
表 4.8	信息成分未译频次断言比较高语篇的高水平变量	134
表 4.9	信息成分错译频次断言比较高语篇的高水平变量	135
表 4.10	信息成分偏译频次断言比较高语篇的高水平变量	135
表 4.11	命题信息损耗率较高语篇的高水平变量	136
表 4.12	信息成分损耗率较高语篇的高水平变量	136
表 4.13	总严重损耗率较高语篇的高水平变量	137
表 4.14	各篇篇内不同类型损耗部分语速与篇语速	138
表 4.15	不同语速组各类型损耗部分平均语速与组平均语速	139
表 4.16	各篇篇内不同类型损耗部分命题信息密度与 篇命题信息密度	139
表 4.17	不同信息密度组各类型损耗部分平均命题信息密度与 组平均命题信息密度	140
表 4.18	数字损耗数据	141
表 4.19	各篇篇内不同类型损耗部分语言复杂度与 篇语言复杂度	142
表 4.20	不同语言复杂度组各类型损耗部分平均语言复杂度与 组平均语言复杂度	143
表 4.21	不同语速组各类型损耗数据	144
表 4.22	不同信息密度组各类型损耗数据	144
表 4.23	信息成分密度水平分组	145
表 4.24	不同信息成分密度组各类型损耗数据	145
表 4.25	不同语言复杂度组各类型损耗数据	145
表 4.26	不同专业性组各类型损耗数据	146
表 4.27	不同口音组各类型损耗数据	147
表 4.28	不同发言类型语篇各类型损耗数据	148

第一章 绪 论

近年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和国际交往的持续深入，同声传译行业蓬勃发展。然而我国同声传译职业化起步较晚，缺乏健全的行业准入制度和有效的质量监控体系，翻译质量难以保证。评估职业译员会议同声传译质量，分析翻译质量影响因素，十分必要。同声传译产品与过程研究一直是国际同声传译研究热点，然而，在我国，此类研究比较缺乏，且国内同声传译研究与国际相比，有较大差距。此外，现有同声传译研究在研究方法、对象、材料等方面尚存一定空缺，同声传译译语内容对应评估在评估方法、评估对象、评估手段等方面也存在明显不足。针对以上问题，本研究拟以信息为评估对象，建立同声传译信息分析体系，描述我国英汉职业译员国际会议同声传译信息损耗，解释信息损耗原因和机制。

1.1 问题的由来

1.1.1 同声传译简介

同声传译指的是译员边接收源语，边近乎同步发布译语的一种口译形式。同声传译工作情形可分为两种：一般意义同声传译，即译员在同声传译工作间中借助专业设备进行翻译；耳语同声传译，即译员不借助设备，在听众耳边进行翻译。本研究谈的是前者。

与交替传译时译员先听后译相比，同声传译时译员边听边译，听译近乎同步，这一特殊工作方式给同声传译工作带来以下几大挑战（Chernov 2004：6，14-15）：源语听辨和译语产出同时进行，“语义噪音”干扰严重；译员须在源语表达完整之前开始产出其译语；译语可用加工时间有限，产出时间、节奏完全受制于发言人，译员与发言人话语产出方式不平等，导致译员面临巨大时间压力（参见：鲍刚 2005：273-278）。此外，同声传译时，译员在专用工作间中提供翻译，与发言人、听众一般没有互动，源语转瞬即逝，译员往往无法请

发言人重复之前话语，或者降低语速，也无法就理解、表达等环节的困难向发言人或听众求助。因此，同传译员面临的情况比较特殊，面对接踵而来的语言信息没有多少回旋的余地……难免遗漏一些次要的内容或者个别地方处理欠佳（张维为 1999：18，46），同声传译中的失误难以避免（仲伟合 2009），尤其是会议即兴发言同声传译中，错译、漏译不可避免（Galsworthy 2016-4-28 讲座；Viezzi 2016-10-19 讲座）¹。负责国家重要外事活动翻译的中国外交部翻译司也认为，与交替传译相比，同声传译总是做不到完美，总会错或者丢一些东西（戴庆利 2016-6-18 会议发言）²。同声传译中，译员精力趋于饱和，一些并不复杂的内容，译员也会错译、漏译（Gile 1999c，1995/2009：182，2011）。上述情形已被一些基于职业译员语料的观察性研究所证实，如：Petite（2005）、Gile（2011）、Lee（2011）、王斌华、古煜奎（2014）等。

同声传译首次试用是 1928 年国际劳工组织会议（Baigorri-Jalón 1999），首次正式使用是纽伦堡审判（Gaiba 1998：19），目前已成为国际会议最常用的一种口译形式。

同声传译在我国较早的一次大规模使用是 1995 年 9 月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大会有 189 个国家和地区的 1.5 万人出席；论坛包括 200 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0 多个组织、3.1 万人参加，是迄今为止联合国举办的，也是中国承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会议；主会场设有联合国 6 种语言——中、英、法、西、阿、俄同声传译，一共举办过 150 多场活动（白易兰 2015）。普通民众对同声传译的较早认识源于 2003 年央视伊拉克战争直播报道。中央电视台首次对多语种采用了高水平的同声传译，在第一时间同步现场直播了美国总统布什的电视讲话、白宫发言人布莱舍的新闻发布会以及境外电视台等提供的新闻素材（王甫、殷乐 2003）。2008 年北京奥运会、2010 年上海世博会等重大国际活动催生了口译（包括同声传译）热潮。近年中国主办的 APEC 峰会、

1 曾为多国领导人提供同声传译的资深译员 Amanda Galsworthy 女士、国际大学翻译学院联合会（CIUTI）现任主席 Maurizio Viezzi 教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举办的讲座中，均提及这一点。

2 中国外交部翻译司副司长戴庆利，在“第八届亚太翻译论坛”（2016.6.17-18，西安）所作“中国外交翻译的新形势、新挑战”的主题发言中提到，国家领导人外事活动一般采用交替传译而不是同声传译，主要出于这一考虑。

G20 峰会等重要国际会议，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同声传译的认识。

21 世纪初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对外开放不断深入，国际交往日益增多，同声传译开始了职业化、专业化发展。口译的职业化应该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有相当部分的译员将口译工作作为主要生活来源，以口译作为职业；二是译员具有职业素养，遵守职业规范，掌握职业技能，这一点更为重要（鲍川运 2007）。近年来，在我国的一线城市及部分会展经济发达的二线城市，以口译为职业的译员队伍不断壮大，其中相当一部分主要从事会议同声传译工作。同声传译成为我国各类国际会议最常用的一种口译形式。同声传译在我国职业化发展迅速，市场需求旺盛，但由于缺乏健全的行业准入制度和有效的翻译质量监控体系，从业人员业务素质与翻译质量难以保证。王恩冕（2005）调查发现：口译市场质量保证体系不完善，口译员业务素质差别较大，总体水平不高。目前我国职业译员会议同声传译质量如何，同声传译中，源语内容译出多少，漏译多少，错译多少，翻译过程中存在哪些影响翻译质量的因素等问题，尚待回答。弄清这些问题有助于了解同声传译行业水平现状，解决行业发展问题，促进同声传译职业化、专业化发展，提升我国对外交流质量。因此，职业译员国际会议同声传译质量评估与过程分析非常必要，但这方面的探讨十分缺乏。

此外，同声传译市场需求的持续增长推动了同声传译教学的迅猛发展。同声传译教学单位从原来的少数几所外语院校，扩展到目前的数百所开设翻译硕士专业（MTI）、翻译本科专业（BTI）的院校，以及众多社会培训机构。然而，我国口译教学面临诸多问题（参见：王立弟 2003, 2007；卢信朝 2006；刘和平 2005：116-119, 2013；仲伟合 2014）。评估职业译员现场翻译质量，分析翻译过程中影响质量的因素，有助于指导同声传译教学总体设计，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培养更多满足市场需要的专业译员。

总之，对职业译员会议现场同声传译质量进行科学评估和客观描写，对同声传译过程进行微观、深入分析，有利于同声传译的职业化发展及同声传译专业化教学的开展，有利于提升同声传译人才质量，从而提升我国国际交往质量。

1.1.2 同声传译研究概述

1.1.2.1 国际、国内同声传译研究对比

国际口译研究的中心一直在西方，尤其是欧洲；在西方口译研究中，同声传译研究占明显优势（Pöchhacker 1995；高彬、柴明颀 2009），一度视为口译研究的代名词（高彬、柴明颀 2010）。

自 20 世纪 60 年代至 90 年代末，国际同声传译研究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参见：Gile 1994；Setton 1999：25-26；Pöchhacker 2004：32-39；张吉良 2011）：（1）实验心理学阶段（60 年代-70 年代初），以 Oléron、Goldman-Eisler、Gerger、Barik 等为代表，以口译实验为手段，主要研究同声传译过程，如停顿、精力分配、听说差（Ear-Voice Span, EVS），产品质量以及噪音、语速等因素对口译的影响；（2）职业译员开展研究阶段（70 年代初-80 年代中期），以巴黎学派（Seleskovitch、Lederer 等）、莱比锡学派（Kade、Kirchhoff 等）、Chernov 等为代表，以总结、反思同声传译教学与实践的理论性研究为主，释意理论是这一阶段的标志性成果；（3）复兴阶段（80 年代中期-90 年代末），研究人员仍以职业译员为主，但更注重借鉴认知科学跨学科成果，将同声传译实践与理论研究相结合。代表学者包括 Gile、Moser-Mercer、Mackintosh、Lambert、Setton 等，代表性成果为同声传译信息处理模式。

20 世纪近 40 年中，国际同声传译研究人员主要分两类：职业译员 / 教师、心理学家；研究范式也分两种：经验式、规范性研究与实证性、描述性研究。

21 世纪以来，国际同声传译研究有何趋势，研究主题、方法与视角有何变化？笔者采用文献计量法，对刊载同声传译主题文章较多的 4 种国际期刊——*Interpreting*、*Meta*、*The Interpreters' Newsletter*、*Forum*（2003 年创刊）在 2000-2016 年间发表的 103 篇英语类同声传译主题论文（手语翻译类论文和书评除外）进行了统计分析。

首先看研究主题。Pöchhacker（2004）将口译研究主题分为过程（双语、同步性、理解、记忆、产出、输入变量、策略等）、产品与表现（话语、源语与译语对应、效果、角色、质量等）、职业（历史、场景、标准、能力、技术

等)和教育(课程、选拔、教学、评估等)。103篇文献中,78篇为过程与产品研究,占76%。其中探讨输入变量、策略与产品质量关系类的文献最多,共64篇,占过程与产品类研究文献总数的82%。

从研究方法看,实证研究共83篇,占81%,其中实验研究28篇,占34%;观察性研究21篇,占25%;调查性研究19篇,占23%。还有一些文章采用混合设计,如实验+调查、观察+调查等。从具体分析分法看,无论是实验研究,还是观察性研究,基本是通过语料转写、标注,源语与译语对应评估,揭示各种输入变量(如语言组合、方向性、语速等)与翻译策略及翻译质量之间的关系。语料主要为实验语料,其次是现场语料。现场语料多数为电视直播同声传译语料,国际会议语料不多,语料来源、数量和代表性等比较受限。

此外,研究的视角不再局限于认知心理学理论,跨学科研究趋势增强。翻译研究、语料库语言学、神经心理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用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也被应用于同声传译研究。用语料库语言学方法分析同声传译产品,成为一个新趋势。

可见,这一阶段国际同声传译研究主要采用实证研究方法,通过实验语料和现场语料分析,对同声传译过程与产品进行跨学科研究,与Yan et al. (2013)对国际口译研究文献分析的结论基本一致。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亚洲地区的文献数量抢眼,共24篇,其中韩国贡献了13篇。同声传译语言组合(尤其是东、西方语言组合)与翻译方向性问题是亚洲学者关注的重点。

我国同声传译研究与国际相比差距明显。武光军(2006)统计发现,1979-2005年间发表的以同声传译为主题的核心期刊论文,全部为介绍性或思辨性的,没有一篇是实证研究。高彬、柴明颀(2010)对1994-2009年间发表的同声传译论文统计分析也发现,同声传译研究以概论性论文为起点,且多是关注口译技能和技能教学等单个维度,研究未能呈现跨学科性。从数量上看,1994-2009年,同声传译研究仅占口译研究约10%(高彬、柴明颀2010),1994-2012年,同声传译研究占口译研究约8.4%,远低于同期交替传译研究占比25.3%(Xu 2014)。此外,同传研究的增量小于口译研究,同声传译研究一直没能成为带动口译研究发展的中坚力量(高彬、柴明颀2010)。

笔者从中国期刊网检索到 2000-2016 年间发表的以同声传译为主题的 CSSCI 期刊论文（书评、同声传译教学设备介绍及应用案例类论文除外）共 58 篇，其中实证研究仅 11 篇，占 19%，11 篇中，实验研究 5 篇，观察性研究 5 篇，调查性研究 1 篇。其余 47 篇文献主要分两类，一类是同声传译教学、策略类论文，经验式、感悟式介绍居多，同声传译过程与产品的深度分析较少，理论聚焦与跨学科研究不足；另外一类是同声传译研究综述、研究方法类论文。

可见，从研究方法看，我国同声传译研究主要以经验介绍或理性思辨为主，实证研究不足。纯经验式的感悟或者纯理性的思辨往往难以如实地反映口译活动的真实性和复杂性，而缺乏实证的科学数据又往往使得理论阐述显得苍白无力，不仅难以充分保证研究过程的系统性、科学性，相关结论的普遍性和代表性常常容易令人质疑（张威 2012）。从研究视角看，我国同声传译研究的视角较为单一，跨学科研究不足，影响了研究的深度和科学性。此外，与国际同声传译研究者多为职业译员的情形完全不同的是，仅极少数研究者有职业口译经验；研究主题、对象、材料等基本围绕课堂教学，对职业同声传译关注不足。

综上所述，过程研究中的输入变量研究与产品质量研究中的源语与译语对应研究是国际同声传译研究的焦点。过程研究往往基于产品质量研究，通过源语 - 译语对应评估来研究输入变量影响。实验语料和现场语料分析是过程与产品质量研究的主要方法。研究人员多为职业译员，研究专业性强。然而，中国同声传译研究，不管是在研究方法，还是在研究主题、研究视角、研究人员构成、研究的科学性、专业性等方面，与国际同声传译研究都有着较大差距。

1.1.2.2 现有同声传译过程与产品研究空缺

如前所述，国际同声传译研究以同声传译过程与产品实证研究为主，但现有研究在研究方法、对象、材料等方面尚存一定空缺。

同声传译实证研究始于实验研究，并一直以此为主要研究方法。由于职业译员的自然真实口译语料不易获取（Kalina 1994；Garzone 2002；Bendazzoli & Sandrelli 2009），绝大多数产品与过程研究基于同声传译实验语料进行。根据

研究问题设计同声传译实验,收集实验语料进行译语质量评估,揭示翻译过程中各种输入变量(如语言组合、方向性、语速等)与翻译策略及译语质量之间关系,成为基本研究模式。Gerver (1969/2002)、Barik (1971, 1975)、Altman (1994)、Tommola & Laakso (1997, 转引自 Chang & Schallert 2007)、Tommola & Helevä (1998)、Mazzetti (1999)、Pio (2003)、Kurz & Färber (2003)、Lindquist (2005)、Chang (2005)、Chang & Schallert (2007)、Bartłomiejczyk (2010)、Díaz-Galaz (2011)、Lin et al. (2013) 等,都属于此类研究。然而,基于实验语料的研究存在以下问题(Gile 1998, 2015; Shlesinger 2000; Pöchhacker 2001):实验变量控制不佳;由于口译受试者资源有限,实验样本一般较少,且多为非随机抽样;实验材料不是真实会议材料;实验场景和真实会议情景差异较大;总之,和自然口译语料相比,实验语料缺乏生态效度,语料代表性差,且过于依赖量化统计。

实验研究的对象也存在问题。由于职业译员资源有限,且安排职业译员进行同声传译实验存在困难,实验研究多以学生译员为研究对象,如 Altman (1994)、Tommola & Laakso (1997, 转引自 Chang & Schallert 2007)、Tommola & Helevä (1998)、Mazzetti (1999)、Lindquist (2005)、Lee (2006)、Bartłomiejczyk (2010)、Díaz-Galaz (2011)、Lin et al. (2013) 等。学生口译学习环境过于理想,缺少变化,与现场真实工作情景差异较大(Donovan 2008);学生译员可能尚未掌握或无法娴熟运用基本技能,且缺乏真实口译经验。因此,学生译员语料的效度、代表性等方面存在问题(Gile 1994, 2015),研究结论能否推广值得怀疑。

总之,实验研究方法存在明显不足,同声传译实验脱离真实同声传译工作情景,实验过程无法反映同声传译工作实际,实验结论难以推广和应用到同声传译实际工作中去。Mackintosh (1983, 转引自 Pöchhacker 2004: 71)、Massaro & Shlesinger (1997)、Shlesinger (1998)、Gile (1994, 1998)、Setton (1999: 45-46)、Lee (2004)、Shlesinger & Ordan (2012) 等都曾表达过此类担忧。

20 世纪,实验研究一直是西方同声传译实证研究主流方法。基于现场真实语料进行语言运用描写和实时言语加工建模的观察性研究运用不足(Setton

2002)。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近年来，受到语料库翻译学发展的影响，基于职业译员现场语料的观察性研究正在成为一种新趋势，实验法主导同声传译实证研究的局面有所改变。尤其是媒体直播同声传译现场语料不断增加，使得同声传译自然研究成为可能，从而为回答口译研究老问题提供了新思路(Gile 2015)。

Wang (2008) 通过中国香港立法会三场会议的汉语(广东话)-英语同声传译语料，分析了职业译员翻译过程中的词汇、句法、语义、情景、语用压缩等压缩现象，以期同声传译中的省略、替换、删减等提供一个新的客观评价视角。杨承淑(2010)以英语-日语-汉语语料¹分析了同声传译中的信息处理特征，探讨了同声传译信息处理过程中的简化、增补、对应等问题，描述了同声传译的技术性操作原则及规范。刘建军、肖德法(2010)分析了天津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英语-汉语同声传译语料中的数字口译错误类型、分布及原因。Gile(2011)研究了奥巴马总统就职演讲译入法语、德语、日语的电视直播同声传译中的未译、错误等现象。张其帆(2011)分析了中国政府副总理发言英语同声传译中的删减与增译现象。Cheung(2012)研究了电视直播同声传译(一个英语源语版本译入五个汉语译语版本)中的未译现象，逐句分析了译语语义及发布错误。Koumba(2014)通过泛非议会英语-法语双向同声传译语料，研究了翻译方向性对翻译表现的影响。王斌华、古煜奎(2014)观察了三位职业译员对奥巴马就职演讲电视直播同声传译的口译产品，考察英汉同声传译的主要相关变量对口译产品中的错误、省略和不当语言表达的影响。仲伟合、邓婕(2014)对两名职业译员专业技术领域汉英同声传译现场语料进行了观察分析，归纳出专业领域同传中信息缺失常见类型、原因以及应对策略，为深入了解专业领域同传的过程特点提供实证基础。Defrancq(2015)基于欧洲议会法语译入荷兰语同声传译语料，研究了短听说差(EVS)是否会对翻译质量产生影响。

此外，不少学者开展了基于语料库的同声传译研究。已建成的同声传译语料库包括德英、中英真实会议及模拟会议语料库(Setton 1999)、联合国大会语料库(Chernov 2004)、日本名古屋大学综合听觉信息研究中心(Center

1 作者所用同声传译语料主要为学生译员课堂口译语料，仅有少量为作者日语译入汉语现场同声传译语料。

for Integrated Acoustic Information Research, CIAIR) 英日同声传译语料库 (Matsubara et al. 2001)、欧洲议会口译语料库 (EPIC) (Monti et al. 2005)、议会及教育培训会议语料库 (Monacelli 2009)、同声传译方向性研究语料库 DIRSI-C (Bendazzoli 2010)、电视口译语料库 (CorIT) (Straniero Sergio 2012)、欧洲足球语料库 (FOOTIE) (Sandrelli 2012) 等¹。上述语料库主要用于口译语篇的语言特征、口译操作过程及处理策略等方面研究, 较少关注译语质量, 尤其是源语与译语对应研究 (参见: 张威 2013:47-51; 陈菁、符荣波 2014)。

观察性研究相比实验研究具有明显优势: 语料真实反映职业译员现场工作状况, 具有生态效度, 分析结论更具说服力 (Monacelli 2009: 159; Gile 1998, 2011, 2015; Pöchhacker 2011)。然而, 由于现场语料获取难度大, 收集和整理工作量大, 现有观察性研究数量十分有限。此外, 此类研究的源语语料来源和主题较单一, 语料多选自政治场合或电视直播, 多为政治类主题, 使用同声传译较多²的非政治类 (如商务类、学术类) 国际会议的语料研究不多, 译员样本较少, 语料代表性受影响。另外, 在研究范围界定、语料选取中的变量控制等研究设计方面, 尚有不少问题未能得到充分重视: 译员职业经验如何? 是否存在接力翻译? 发言方式是致辞、演讲还是讨论或问答? 发言人是否有稿、是否读稿、译员是否带稿? 语速、信息密度、口音、语言复杂度、专业性等源语变量水平如何, 等等。

综上所述, 现有研究在反映同声传译工作真实性、同声传译输入变量丰富性、语料与译员多样性和代表性等方面还存在不足, 影响了研究结论的可推广性。国际上, 基于多名职业译员、多场国际会议 (非政治类) 现场语料的产品与过程观察性研究, 尤其是产品质量研究中的源语 - 译语对应研究, 比较缺乏。在我国, 目前此类研究十分缺乏, 特别是由职业译员开展的此类研究近乎空白。

1 我国上海交通大学胡开宝教授领衔的团队建设的“汉英会议口译语料库 (CECIC)” (胡开宝、陶庆 2010) 的语料主要为新闻发布会交替传译语料。

2 根据 Neff (2014), 相比政府与国际组织, 私营部门提供了绝大多数口译工作机会, 在北美、亚太、中东、中南美, 65%-93%的工作机会来源于私营部门。

1.1.3 同声传译译语内容对应评估方法与不足

口译质量研究可分为口译交际参与者态度、需求、观点调查性研究，与口译可录制产品或交际过程研究两类 (Pöchhacker 2001)。同声传译中，译员在同声传译工作间通过专业设备发布译语，极少与发言人、听众等交际参与者互动。因此，同声传译质量研究，除了调查性研究外，一般都是研究同声传译产品质量，即分析同声传译译语质量。同声传译产品质量分析是许多同声传译研究的重要工具、出发点和落脚点。建立一套可靠的产品质量标准是同声传译研究三大主要目标之一 (Setton 2002)。

译语质量分析角度较多，但大致分为“译语-源语内容对比、译语语言表达与译语发布方式评估”(Shlesinger 1997; Kalina 2002; Pöchhacker 2004: 188; 杨承淑 2005: 235-240; 卢信朝、王立弟 2015)，可概括为译语的“内容与形式”(Gile 1995/2009: 35-36) (形式包括语言表达与发布方式) 两大块，即译语内容的忠实性/准确性 (Accuracy、Faithfulness、Fidelity、Informativeness)、译语语言表达与译语发布方式的可理解性 (Appropriateness、Comprehensibility、Intelligibility)。准确、清晰、忠实等是质量评估最基本的概念，准确和忠实属“产品视角”评估，强调译语对源语的忠实反映；清晰则属“听众视角”评估，关注译语的可理解性 (Pöchhacker 2002)，译语内容忠实性/准确性分析最为核心 (Pöchhacker 2001)；译语能否表达出源语内容对于成功交际至关重要，这一点对于同声传译比其他形式的翻译更为明显 (Alexieva 1999)。忠实性/准确性分析通常是通过译语与源语内容的对应 (Correspondence) 和偏离 (Departure、Deviation、Discrepancy、Divergence) 评估进行 (以下简称“译语内容对应评估”)。译语内容对应评估研究是产品研究中最核心、最具理论性的研究问题 (Pöchhacker 2004: 141)。

译语内容对应评估中的“内容”具体指什么？

口译员的首要工作是传递信息，译语准确传递源语信息是口译成功的关键 (Massaro 1978; Namy 1978; Bühler 1985, 1986; Kurz 1993; Altman 1994; Moser-Mercer 1996; Roy 2000: 43, 125; 刘和平 2001; Falbo 2002; Chernov 1994, 2004: 54; Pöchhacker 2004: 56; Kalina 2005; Gile 1995/2009: 38; 杨

承淑 2010), 这几乎是口译员和口译研究人员的共识。作为口译形式的一种, 同声传译也应以传递信息、促进交际为根本宗旨。译语与源语信息等值是同声传译的基本原则之一(仲伟合 2001), 也是同声传译译语忠实度评估的基本指标(杨承淑 2005: 236-239)。可见, 同声传译源语与译语的内容对应指的应是信息内容的对应。不少研究在探讨口译过程和产品时都谈及信息内容(Information Content)概念, 如 Setton (1998)、Yagi (2000)、Pöschhacker (2004: 58, 128, 131)、Sandrelli (2012)、Kraviarová (2013)、Gile (1999b, 2015) 等。译语内容对应评估本质上应是信息内容评估。

现有同声传译译语内容对应评估方法包括错误分析(Error Analysis)和命题分析(Propositional Analysis)等。这些评估方法均存在明显不足, 难以有效评估信息内容。

1.1.3.1 错误分析法

1) 方法介绍

错误分析法通过统计分析译语相较源语的添加(Addition)、未译(Omission)¹、替换(Substitution)和错误(Error)的类型、频次来评估译语对源语的偏离情况。

错误分析法可追溯至 Gerver (1969/2002) 的源语语速对同声传译译语质量影响的研究。该研究对译语中的错误和不连贯, 包括未译(词、词组、8 词及以上)、替换(词、词组)、修正(词、词组)进行了统计分析。这是错误分析在同声传译译语质量评估中的最早应用。之后不久, Barik 提出了“最全面的添加、未译、替换及错误标注体系”(Lambert & Moser-Mercer 1994: 9)。

Barik (1971, 1975) 统计了 2 名职业译员、4 名非职业译员英语 - 法语双向同声传译实验语料中的翻译偏离(Departures of Interpretation)类型和频次。Barik 提出的偏离类型主要包括: 未译, 包括主动略过、理解型未译、滞后型

1 虽然中文文献一般将 omission 译为“省略”, 但“省略”一词有主动性、策略性意思, 而 omission 包含了“被动性遗漏”和“主动性省略”两种情形, 故本研究将 omission 译作“未译”, 该表述更为中性, 可包含主动性和被动性两种情形。

未译、合成型未译；添加，包括修饰型添加、解释型添加、逻辑关系添加、句子收尾添加；替换和错误，包括轻度语义错误、严重语义错误、轻度措辞更改、实质性措辞更改、重大措辞更改。Barik 对译语偏离类型进行了统计分析：统计了不同类型译员的源语 100 词所对应译语中的未译频次及未译量，译语 100 词中添加与错误的类型、频次。之后，Barik 提出“错误指数”（Error Index）概念，将两种偏离——未译和错误合并，得出“翻译偏离总指数”（General Index of Translation Disruption），以此来评估译员的总体表现。

Barik 是同声传译错误类型和形式研究先驱之一，此前还没有其他学者敢于研究同声传译错误这一争议性话题（Lambert & Moser-Mercer 1994: 9）。Barik 分析体系分类全面、详细，具有开拓性意义（Setton 1999: 31; Pöhhacker 2004: 142），为译语质量评估提供了分析框架和工具，使得同声传译译语质量对比成为可能。许多同声传译实证研究或全部照搬，或部分借鉴这一分析方法。

Yom (1993) 在研究主位 - 述位结构类型对韩语译入英语同声传译表现影响时，借鉴该体系，对比了学生译员与职业译员同声传译及笔译译语质量差异。Altman (1994) 在以错误分析改善同声传译教学的先导研究中，分析了学生译员法语译入英语同声传译实验语料中的常见错误：未译、添加、个别词汇翻译不准确、较长词组翻译不准确。Lambert et al. (1995) 在研究职业译员注意力分配方式与同声传译表现的关系时，对译语中的错误、未译及添加的类型和频次进行了统计分析。Moser-Mercer et al. (1998) 在研究同声传译单轮时间过长对译员表现影响时，按意义错误（包括意思完全相反、意思不同、无意义、意思不准确四类）、未译、添加等来评估译语。Riccardi (2002) 将替换、未译和添加作为译语与源语内容对应评估指标，纳入其译语描述性评估体系。Pio (2003) 在源语语速对同声传译质量影响的研究中，参考 Barik 分类体系，分析了学生译员和职业译员同声传译实验语料中的错误：信息丰富词汇的未译，信息或者修辞价值丰富的词组、句子未译，句子合成、解释或者完全改变意思，添加新内容，词组、句子之间逻辑关系错误等。Lee (2006) 在分析对比学生译员韩语 - 英语两个方向同声传译的错误类型和频次时，将错误、添加、未译、偏离、过度浓缩与概括作为意思错误类型纳入评估体系。Gile (2011)

在研究奥巴马总统就职演讲译入法语、德语、日语的电视直播同声传译语料时，对比了未译、错误、语言表达不当等在不同译员、不同语言组合译语中的分布频次。张其帆（2011）分析了汉英同声传译的删减（Omission）与增译（Addition）现象，将删减现象分为完全省略和归纳省略两类，将增译分为显化、脱壳、补充三类。Lin et al.（2013）在有口音英语源语对同声传译准确度影响的研究中所采用的译语准确度5分制评估标准，也主要根据未译、添加、错误的频次和严重程度来评分。

2) 方法不足

以 Barik 分析体系为代表的错误分析法诞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助推了 80 年代兴起并持续至今的口译质量研究热，成为同声传译译语质量研究乃至整个同声传译研究的重要工具。然而，错误分析法自身存在明显不足，且并不适用于同声传译译语内容对应评估。

错误分析法因缺乏科学的理论基础，缺乏统一、清晰的分类标准而广受诟病：对错误的定义不准确（Gile 1998）、不清晰（Stenzl 1983，转引自 Gile 1994；Moser-Mercer 1996；Falbo 2002）；方法适用性有争议，下定义（如未译的定义）难（Garzone 2002；Mead 2005）；错误分类不清晰，错误类型重叠且未按严重程度排序（Moser-Mercer 1996）。

以 Barik 分析体系为例，该体系分类较为混乱。首先，该体系未区分意思偏离与形式偏离。虽然该体系声称以意思对等作为基本维度，但体系中包含了不少形式偏离但意思不偏离的类型，如未译中的主动略过、添加中的修饰型和解释型添加、替换和错误中的轻度措辞更改等。其次，有的类型按照原因、目的分，有的按照结果分。未译类主要按原因分，添加类主要按目的分，替换和错误类主要按结果分，还有的按照偏离量大小分。由于缺乏统一分类标准，类型间的界限模糊，重叠较多，分类可操作性差。大类中，替代和错误一般涉及未译和添加，添加和替换难以区分；小类中，理解型未译和滞后型未译的界限模糊，轻度语义错误与轻度措辞更改、严重语义错误与实质性、重大措辞更改均存在重叠。Altman、Pio 等人的分析体系也存在类似问题。

此外，由于没有具体确定源语与译语对应评估单位，难以准确评估译语质量，不同译语之间也难以进行质量对比。Barik 计算每 100 个源语或译语词汇

中出现的错误频次，Lambert et al. (1995) 计算正确译出的词汇数占总词汇数比例等统计方法，都以词汇作为评估单位，以词汇统计代替信息统计，难以科学、客观地反映译员真实表现。

除了自身存在不足，该方法也并不适用于同声传译译语内容对应评估。错误分析仅对比词汇 - 语义，不考虑功能与语用 (Setton 1999: 31; Pöchhacker 2004: 143)，将语言形式、意义与信息混为一谈 (参见 2.1.2、2.2.2.1)。

首先是未弄清语言形式与信息的关系。错误分析的出发点是研究译语信息内容偏离，但在评估中却设计了语言形式偏离类型，如 Barik 体系中的措辞更改。译语内容对应评估不应以语言对等为标准 (Falbo 2002; Pöchhacker 2004: 143)；不是源语与译语语义结构完全相同才能实现语用忠实，词汇不对应、句法结构重组并不一定会歪曲源语意思，微观层面对应不应成为译语质量标准 (Setton 1999: 31, 243)；要产出可接受的译语，语言形式的一定偏离是必须的 (Gile 1992: 188)。而且，语言层次对应评估也难以操作。由于不同语言表达方式差异大，在评估不同语言组合的同声传译译语时，语言组合间差异性大，所需考察的错误类型可能多种多样，如果分类过细，如 Barik 体系，则过于繁琐，难以操作，易于出错；而如果分类过粗，如 Altman 体系，则难以得出有意义的分析结果。

其次是没有弄清语义和语用的关系。该方法忽略了韵律及话语语用效果的宏观分析 (Setton 1999: 31)，未能区分语义学中的静态意义和语用学中的有效用的语境化意义。词汇、句子的功能及所传递的信息需要置于语境及交际情境中考察评估。

此外，错误分类体系没有考虑到会议口译与笔译评估标准的差异 (Bartłomiejczyk 2007)；未能考虑同声传译的时间压力等特殊困难，有些错误类型可能是译员应对困难的应急或修补策略，却恰恰能够改善总体翻译表现 (Gile 1999a; Garzone 2002)。

1.1.3.2 命题分析法

1) 方法介绍

错误分析通过统计译语问题来评估同声传译质量，命题分析则通过统计源语内容成功表达比率进行评估（Bartłomiejczyk 2007），即通过对比译语译出源语命题的比例来评估。命题分析法的理论基础可追溯至 Kintsch 提出的命题理论。Kintsch 于 1970、1972、1974 年提出并详细阐述了命题理论，该理论后来成为文本记忆实验研究的重要工具（Turner & Greene 1977）。

Turner & Greene (1977) 撰写了命题分析实用手册，首次对 Kintsch 命题理论的应用做了详细介绍，阐述了命题分析具体方法，介绍了文本基（Text Base）的构建以及具体应用：命题是意义单位，每个命题由论元和谓词构成，表征一种意思；命题分述谓型、修饰型、连接型三种；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命题构成的一个整体称为文本基，文本的意思由文本基进行表征；文本基包含宏观结构命题，相当于文本的大意，和微观结构命题，补充各种细节内容，一个文本可能有一层或多层宏观结构构成；由于命题由论元和谓词两部分构成，且命题分述谓、修饰和连接型三种，加上命题之间常常相互嵌套，文本基的构建或者文本命题化需参照“九步法”规则进行；文本基构建的目的是命题分析记分，在回忆实验中，通过将受试者回忆产出文本的文本基命题与源文本的文本基命题对比来记分。

Bovair & Kieras (1981) 基于 Kintsch 命题理论及 Turner & Greene 命题分析方法，提出了适用于技术型文本的命题分析方法。该方法将命题分为 10 个大类、29 个小类：动词型命题（包括 9 类：简单动词型、动词 + 介词型、双动词型、动词 + 命题论元型、非谓语动词、may、have、to be、become）、修饰词（包括 5 类：单一修饰、多重修饰、否定、时间、复杂专有名词）、介词（包括 3 类：作谓词的介词、作连接词的介词、无需表征的介词）、数量命题（包括 4 类：number of、amount of、rate of、degree of）、部分与整体关系及所有关系、最高级修饰词、比较结构、问句、连接词（包括 3 类：逻辑连接词、命题连接词、简化连接词）、特殊构式（包括 5 类：代词、存现句、example of、同位词组、习惯性搭配）。此方法还将命题化步骤从“九步法”变为“四步法”（其中第三

步又分四小步)。这一方法也存在如歧义, so great that、some-other、复杂结构、of 等特殊结构的表征困难等问题。

文本命题化示例如下, 选自 Chang (2005)。

源语文本: Good morning. One year ago this month, our country set a bold new course in public education.

命题化:

S1 P1 (MOD MORNING GOOD)

S2 P1 (TIME P3 ONE-YEAR-AGO)

P2 (TIME P3 THIS-MONTH)

P3 (SET COUNTRY COURSE)

P4 (POSSESS WE COUNTRY)

P5 (MOD COURSE BOLD)

P6 (MOD COURSE NEW)

P7 (IN P3 EDUCATION)

P8 (MOD EDUCATION PUBLIC)

Mackintosh (1983, 转引自 Pöschhacker 2002, 2004: 71; Gile 2015) 在实验研究中使用基于 Kintsch & Van Dijk 命题理论所设计的译语信息内容记分方法, 研究一般同声传译与接力同声传译中的信息损耗。Lambert (1983, 转引自 Dillinger 1989) 将命题分析法用于回忆与识别实验, 对比了受试者在跟读、同声传译、交替传译及一般听力理解任务后的回忆与识别表现。Dillinger (1989, 1994) 也通过命题分析法, 对比职业译员与一般双语者同声传译表现, 以及同声传译及一般听力理解任务后的回忆表现, 研究同声传译过程与一般听力理解过程是否存在差异。

Tommola 等人借鉴并调整了 Bovair & Kieras 命题分析法并将之用于多次同声传译实验研究, 研究表明, 命题分析法衡量同声传译准确性, 相对简单、有效、可靠 (Tommola & Helevä 1998; 图莫拉 2002)。使用命题分析法时, 首先通过若干谓词和论元构建源语语义成分表征, 即建立源语文本基, 之后将译语逐词转写并将之命题化, 建立译语文本基, 再将译语和源语文本基中的命题进行对比, 当源语命题明显存在于译语中时给予记分 (以解释、总结的方式所表

达的命题，只要表达了源语命题内容，也记分)，最后计算出译语译出命题百分比，并将之与其他译语对比，确定译语质量好坏 (Tommola & Helevä 1998)。

Tommola & Lindholm (1995, 转引自 Pöschhacker 2004: 127-128) 采用命题分析法研究了噪音、视频图像等变量与同声传译译语质量的关系。Tommola & Laakso (1997, 转引自 Chang & Schallert 2007) 采用命题分析法研究了芬兰语 - 英语学生译员同声传译方向性、源语停顿变量与译语质量的关系。Tommola & Helevä (1998) 采用命题分析法研究了芬兰语 - 英语学生译员同声传译方向性、源语难度与译语质量的关系。Tommola et al. (2000) 在通过 PET 技术就职业译员 A 语 - B 语不同方向同声传译、A 语和 B 语分别跟读时的脑区激活模式进行的实验研究中，采用命题分析法对比了英语跟读、芬兰语跟读、英语译入芬兰语同声传译、芬兰语译入英语同声传译的表现。

有些学者在研究中将命题分析法和错误分析法结合使用。

Hamers et al. (2002) 在研究同声传译经验、双语习得时间与同声传译时的大脑半球控制偏好之间关系时，借鉴 Turner & Green 的文本基构建“九步法”规则，构建了两个源语文本和两个译语文本的微观结构文本基，对比了源语中相同和类似命题在译语中的译出比例，同时还对比了译语中的错误、未译、添加的比例。Chang & Schallert (2007) 在研究英语 - 汉语同声传译方向性影响时，借鉴了 Bovair & Kieras 命题分析法，对比不同译语的命题译出情况，并且统计分析了解译语中添加命题、错误命题和未译命题的比例。

2) 方法不足

相比错误分析法，命题分析法基于科学的理论，具有统一的分析标准和清晰、可量化的源语、译语评估对比单位，有利于评估操作及不同译语间内容偏离的对比，在近年来的同声传译译语质量分析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如同错误分析法，命题分析法也广受批评 (参见：Bartłomiejczyk 2007, 2010)，方法本身及其适用性也都存在问题。

首先，命题分析法分析逻辑站不住脚。该方法将源语与译语文本信息流分解成若干命题语义碎片，再进行两种语言语义碎片对比。这点是否可行必须基于三点假设：源语文本的信息之和等于语义碎片之和，译语文本的信息之和等于语义碎片之和，源语语义碎片和译语语义碎片具有可比性。前两个假设并

不成立，因为语义不等于信息，割裂后的语义碎片之和更不可能等于信息之和。对听众来说，有些语义碎片加在一起甚至无法成句。这一点 Baker (1980)、Leech (1981: 123) 等早已明确指出。第三个假设也不成立，因为语义分解受语言约束，两种语言文本分解后的语义是否可比是个问题 (Pöchhacker 2004: 142)；而且如果前两个假设不成立，第三个假设几乎没有意义。

其次，源语文本基中各命题的信息地位、功能未作区分，比如，未能区分焦点信息、非焦点信息、主题信息、非主题信息、冗余信息等。Tommola & Helevä (1998) 也意识到不同命题应赋予不同分值，然而具体如何判断和操作，并未作出说明。而且，译语文本基中各命题与源语命题对比时，仅按是否译出进行量化统计，对于译出质量（如在多大程度上译出）未作质性评估，影响了译语内容质量评估的科学性。

再次，命题分析法要构建源语和译语文本基，将源语与译语文本分解成数量可观的命题，分解过程极其繁琐复杂，操作层次微观，主观性较强，极易出错。

此外，命题分析法并不适用于同声传译译语内容对应评估。命题分析法将评估对象从语言形式和意义彻底转向了意义，虽然摆脱了语言结构分析，却也仅止步于意义——碎片化的词汇 - 语义，即仅关注语义而不关注语用或者信息。而且，命题分析法设计之初主要用于书面文本分析，对会议同声传译中常见的非读稿演讲及互动性较强的问答、讨论等即兴口语及其译语，该方法显然不适用。即兴发言源语及其同声传译译语往往口语特征明显，非流利、不规范及冗余性表达较多，命题分解过程十分复杂，命题化操作难以开展。

1.1.3.3 其他评估方法

Setton (2002) 提出过命题内容分析法。该分析法相较于文本基法，分析的意义单位增大，分析操作更简便，但是缺乏理论框架和分析标准，命题界定不清晰，且仍止步于词汇 - 语义分析。

此外，有些学者根据研究需求自行设计量表，或借鉴调整笔译标准设计量表来评估译语。Lee (1999) 设计了 7 分量表测量英语句子译入韩语的准确性；Sabatini (2000) 设计了 12 分量表评估英语译入意大利语的忠实性；Lin

et al. (2013) 采用了 5 分量表评估英语译入汉语的准确性; Díaz-Galaz (2011) 借鉴 3 分制笔译准确性量表, 从词汇、句法和语义三个维度考察译语损耗情况; Tiselius & Jensen (2011) 借鉴并调整 Carroll 的机器翻译测量标准, 设计了 6 分量表, 分别用于测量译语语言的可理解性与信息的忠实准确性。此类评估也基本局限在语义分析层次, 且因缺乏科学理论框架和清晰的操作标准而难以令人信服。

国内也有学者研究译语信息评估单位及评估方法。蔡小红 (2003, 2007: 42-49) 提出包括信息点、信息意层与信息结构在内的口译 (未明确区分同声传译与交替传译) 信息评估体系, 从信息点译出量和信息结构实现率两方面进行译文信息量化分析。该体系以语义单位为信息单位。语义单位或者信息点, 包括单词 (转折词、形容词、副词)、词组、义段或意群等, 是信息评估的数量指标。信息意层和信息结构是信息评估的质量指标。信息意层指一个完整的意义级层, 如因果关系中的原因级层, 叙事结构中的时间或地点级层; 信息结构指一个完整的意义结构, 如关系结构 (因果结构)、事件结构 / 叙事结构、观点结构 / 论证结构等。该评估体系将数量指标与质量指标相结合, 既注重微观信息单位译出数量评估, 又注重宏观语篇信息建构质量评估。洪诗谐 (2007)、庾恺珊 (2009) 使用该体系对同声传译中的信息传递情况进行了量化评估。

然而, 该体系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是概念界定不够清晰, 划分标准不够统一。比如, 信息点既包括词、词组, 又包括义段或意群, 不同信息点具体如何划分? 义段或意群具体指什么? 与信息意层及信息结构有何区别与联系? 信息意层和信息结构具体包括哪些? 关系结构、观点结构等信息结构如何界定和划分? 这些问题尚待回答。其次, 评估方法不易操作, 并不属于作者所强调的“简便有效、适应性强、且可反复操作的手段” (蔡小红 2003)。作者的评估示例主题内容简单, 语篇短小, 表达规范, 层次清晰, 与真实会议发言差距较大。对于主题内容复杂、表达不够规范、逻辑不够清晰、口语特征明显的真实会议即兴发言, 信息意层与信息结构划分操作困难。再次, 对于信息结构实现率和信息译出量的关系, 作者未予说明。比如, 信息结构及信息意层未能实现的情形有哪些? 未实现的信息结构及信息意层中的译出信息量是否统计? 如何统计? 此外, 该评估体系将词列为信息点, 混淆了语言形式、语义和信息。

其他学者的研究，如张培蓓、任静生（2006），也存在类似不足。此外，有些研究对各源语信息单元设定权值，对译语信息译出情况进行加权计算，最终精确计算出译语信息传递量，如张培蓓、任静生（2006）、庾恺珊（2009）。然而，源语信息地位和价值受听众认知水平、状态和目的影响，评估者很难替代听众对源语信息轻重主次作出非常精确的判断。

此外，还有不少研究将信息内容作为译语质量主要评估对象，Dubrovsky & Weller（1990）认为，译语评估主要包括信息内容、译语流利性、完整性、语音等方面；Anderson（1994）将译语质量评估分为信息内容与译语可理解性两个方面；Falbo（2002）直接将内容等同于信息，认为源语与译语内容对应评估不应考察语言对等，而应考察信息对等。Russo（2005）从信息内容和发布两个角度评估电影口译质量；Bendazzoli（2010）的口译分析涉及信息内容和信息形式；Altman（1994）、Fernández（2013）也认为译语质量评估一般分为信息内容与发布两个角度；Gile（1995/2009）、Chevalier & Gile（2015）从信息内容和形式两个角度评估译语质量；Sunnari & Hild（2010）从译语信息内容、语言表达和发布方式三个角度评估。也有不少研究在分析同声传译过程或产品时提到信息损耗（Information Loss），如Dejean（1990）、Al-Salman & Al-Khanji（2002）、Kurz & Färber（2003）、Todoroki（2004）、Gile（2008）、Rennert（2008）、Bevilacqua（2009）、Hild（2011）、Köpke & Signorelli（2011）、Liontou（2012）等。

然而，上述研究并未具体界定信息，没有提出信息判定与衡量的具体方法，未能建立源语与译语信息分析体系。虽有研究将信息损耗作为重要研究参数进行观察和分析，如Mackintosh（1983，转引自Pöschhacker 2004：71）、Shlesinger（2003）、Kurz & Basel（2009）、Díaz-Galaz（2011）、Hild（2015），但是分析仍然停留在语言形式或语义层次，并未从信息角度展开。

Gile（1998）指出，还没有可以测量口译中信息传递量的标准。Falbo（2002）虽然建议从信息对应角度评估内容对应，将对应分为信息添加、信息损耗和信息错误修复，并将信息损耗分为信息消失、夸大型损耗、降调型损耗、概括型损耗、情感与修辞强度损耗、语篇连接型损耗，但是信息损耗的分类因缺乏科学理论基础，出现界定不清晰、标准不统一、类型交叉重叠等问题。此外，

Falbo 虽然提出内容评估存在两大挑战——确立对比的信息单位与对比标准，但也未能提出具体方案或建议，而且也承认其评估体系仅是设想，是否可行有待具体语料分析加以验证。

综上所述，以错误分析法、命题分析法为代表或为基础的译语内容对应评估方法，开辟和拓展了同声传译译语内容对应评估研究，推动了同声传译译语质量研究乃至整个同声传译实证研究的发展。然而，这些评估方法存在明显不足。

首先是评估对象错位，评估语言形式、语义而不评估信息，导致语言表达不当但信息未必偏离，而“语义内容完全准确却未必语用适当”（Clifford 2001）等情形难以得到科学和客观的评估。对于结构差异较大的语言组合，如英语-汉语组合，这一问题会更突出。

伴随评估对象错位的是评估手段问题。上述方法在评估时，完全基于录音转写文本，忽视录音韵律特征（如音高、停顿、语调等），忽视会议背景、发言资料、源语语境及交际情境的作用，静态、僵化地评估语言形式或词汇-语义，而未能进行动态、语境化、情境化的信息评估。

虽有不少研究声称进行信息评估，但是由于缺乏科学的话语信息理论指导，没有清晰界定同声传译中的信息及信息损耗，未能建立系统、具体、清晰、可操作的源语信息衡量体系和译语信息损耗评估体系，未将体系用于会议现场真实语料分析，未将文本与录音、会议背景、发言资料、交际情境相结合进行动态、语境化、情境化评估，最终无法进行真正意义的信息评估。

总之，“使用词汇对比或命题对比来评估译语内容的评估方法需要校正”（Gile 1999a, 1999b），同声传译质量评估需“从语言评估走向语境化的评估”（Garzone 2002），从语言评估走向信息评估。

1.1.4 小结

从同声传译实践和教学角度看，评估职业译员真实会议同声传译译语质量，分析同声传译过程中影响译语质量的因素，是推动同声传译职业化发展及同声传译教学专业化开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对同声传译职业化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的我国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

从同声传译研究角度看，过程研究中的输入变量研究和产品质量研究中的译语内容对应研究，是国际同声传译研究的焦点，但此类研究在我国还比较缺乏。对我国职业译员现场同声传译产品质量及翻译过程进行描述和分析，有助于丰富、深化我国同声传译实证研究，填补国际同声传译产品与过程研究的部分空缺，填补我国由职业译员开展的，基于多名职业译员、多场国际会议现场语料的产品与过程深度研究的空白。

译语内容对应评估是译语质量评估的核心和基础，也是同声传译实证研究的重要研究手段。一套可行、可靠的译语内容对应评估方法或标准体系至关重要，但现有评估方法存在评估对象错位、评估手段单一等不足。

传递信息是同声传译工作的首要任务和成败关键，“信息评估”应是同声传译译语内容对应评估的基本方法。然而，围绕“信息评估”的许多问题尚待回答：同声传译中的源语信息如何界定？源语信息如何衡量和统计？译语信息损耗如何评估？同声传译信息损耗现况如何？信息损耗的原因和机制有哪些？等等。有必要借鉴有关理论，建构以语用为视角，以信息为评估对象，以动态、语境化、情境化评估为手段的同声传译信息分析体系。

1.2 研究的总体介绍

1.2.1 研究对象、范围

针对现有同声传译产品与过程研究在研究对象、材料等方面的空缺，本研究对研究对象、材料选取范围作如下界定。

以具有一定职业经验的职业译员为研究对象，对国际会议同声传译现场真实语料进行观察性研究。译员具体选取标准为：以同声传译为主要生活来源；收集语料时为一线活跃译员，年均从事同声传译超过 80 个工作日；接受过硕士层次专业会议口译培训，有累计 5 年以上且 300 个工作日以上同声传译工作经验，有多场省部级以上会议同声传译经历，或者虽未接受过专业会议口译培训，但累计有 10 年以上且 600 个工作日以上同声传译工作经验，有多场国家

级会议同声传译经历¹。英汉同声传译使用最广泛，译员队伍最庞大，因此，译员语言组合定为英语-汉语组合。

再界定研究语料选取范围。与改革开放初期国际活动主要集中在政治、外交领域不同的是，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及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化，非政治、外交类国际会议，尤其是商务类、学术类会议，呈井喷式增长。由私营部门举办的商业性发布会、推介会、招待会、培训会、报告会、咨询会、论坛、峰会及学术研讨会等，对同声传译需求旺盛，需求量远超政治、外交类会议²。此外，根据笔者逾 1000 场次的会议口译经验，一般情况下，政治、外交类会议较注重仪式、程序或形式功能，其程序性、程式化特征较明显，读稿发言较多，互动较少，信息表达较为委婉、迂回，且常常涉及文化与社会背景因素，话语信息分析较为复杂；商务类、学术类会议侧重信息内容分享，发言的即兴性特征较强，互动性强，一般除致辞、演讲环节外，还有一定的讨论或问答环节，发言信息量大，表达较为直接、清晰，明示信息多、暗示信息少，且往往较少涉及文化与社会背景因素，更常以“同一种声音或话语体系”进行表达和交流，话语信息分析相对容易（参见：卢信朝 2013：174-178）。综上，商务类、学术类会议即兴非读稿发言同声传译中的信息损耗更值得研究，适于研究，便于研究。

再看翻译方向。国际口译员协会(AIIC)将译员的工作语言分为三种(AIIC 2012)：A 语言、B 语言和 C 语言。A 语言指译员的母语或能如母语一样运用的语言；B 语言指接近译员母语运用水平，听、说自如的语言；C 语言指译员能如母语一样可以完全听懂的语言。同声传译中，译员应从 B 语言或 C 语言

1 具体条件的设定，参照了 Neff (2014)、AIIC (2013)、Christensen (2011)、Timarová et al. (2014)。Neff (2014) 调查显示，2010、2012 年 AIIC 译员平均工作天数分别为 89、88 天。AIIC (2013) 规定，申请加入该组织的译员应至少有 150 个工作日的会议口译经验。考虑到译员从毕业进入市场积累经验到成为活跃译员至少需要 2-3 年时间，故将累计工作年限和累计工作天数设定为 5 年以上及 300 个工作日以上。此外，Christensen (2011) 认为，专业培训，尤其是硕士层次的培训，是成为会议口译员的重要条件。Timarová et al. (2014) 也指出，欧盟机构间口译员认证考试明确要求申请者接受过专业培训。鉴于我国具有丰富口译经验但未接受过专业会议口译培训的职业译员较多，将此类译员也纳入研究范围，但参考 Timarová et al. (2014) 研究设计——未接受过专业培训的译员拥有更长时间的职业经验，对此类译员提高工作时间及会议级别条件。

2 这与 Neff (2011, 2014) 对全球译员工作市场调查的结果一致。

译入 A 语言，一直是西方会议口译传统 (Pöchhacker 2004: 21)，经常雇用译员的国际组织以及 AIIC，也一致认为应该只能译入 A 语言 (Gile 2005)，口译研究者和教师一般也支持从 B 语言译入 A 语言 (Bartłomiejczyk 2006)。汉语是笔者的 A 语言，英语是 B 语言，对汉语译语的评估比对英语译语的评估更便利。此外，笔者实践观察及与译员同事交流发现，作为绝大多数英汉职业译员的 B 语言，英语源语听辨理解困难较多，且英语发言往往信息量大，脱稿即兴发挥多，英语译入汉语方向信息损耗似乎更多 (参见：卢信朝 2013: 178-179)。因此，本研究仅探讨英语源语发言译入汉语方向 (接力翻译不在研究范围内) 的同声传译。

综上所述，本研究以英汉职业译员为研究对象，将商务类、学术类会议英语即兴非读稿发言及其译入汉语的同声传译语料纳入研究范围。

1.2.2 研究问题

现有译语内容对应评估主要基于文本，进行词汇 - 语义的静态、机械对应评估，评估方法无法反映同声传译传递信息、促进交际这一根本宗旨。本研究将评估从词汇 - 语义提升至语义 - 语用层次，将文本与会议背景、发言资料、语境、情境及韵律特征等相结合，进行动态、语境化、情境化的源语 - 译语信息对应评估。

源语 - 译语信息不对应包括两种情形：源语中存在的信息，译语中不存在；源语中不存在的信息，译语中存在。前者包括源语中的信息在译语中被错译、漏译，后者包括源语中的信息在译语中被错译，或者源语中不存在的信息被添加到译语中。因此，不对应情形实际具体分为三种：源语中的信息在译语中被错译、漏译、译语中添加了源语中不存在的信息。

笔者通过实践观察及前期先导研究发现，错译、漏译比较容易确定；添加则较为复杂，大致包括三种情形——源于错译 (包括译员未意识到的错译和能够意识到的错译) 的添加，译员为改善译语信息表达质量或传递效果而进行的解释性添加，译员在加工困难过大时，为了保护自己、保持译语不中断而进行的编造、添加 (又分根据源语提示进行的编造、添加和无源语提示编造、添加)。

由于错译比较容易确定，且错译往往造成添加，第一种添加情形可等同于错译，按错译进行评估。后两种添加情形可根据添加对其他源语信息传递的影响分为两种：添加影响了其他源语信息传递、添加不影响其他源语信息传递。当添加影响了其他源语信息传递时，一般可通过对比源语、译语发现错译证据，此类添加还是等同于错译。因此，多数添加情形与错译情形重合，故在错译中一并考察。余下的两种添加类型——无源语提示编造、添加（编造、添加内容和源语没有明显关系）和解释性添加，对源语信息传递没有影响。本研究着眼于评估源语信息的传递情况，对这两类情形，不作考察（参见 3.1.4.2）。

综上，本研究考察源语信息在译语中的损耗情况（以下简称“译语信息损耗”或者“信息损耗”），即源语信息在译语中被错译（词汇级损耗又分错译和偏译，详见 2.2.2.2）、漏译的情形。信息损耗是本研究的主线和焦点。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研究的信息损耗中的“信息”指发言人以源语所传递的信息，不包括发言人的表情、动作、体态等所传递的非语言信息。同样，“译语信息”指译员以译语所传递的信息（参见 2.2.1.1）。

考察信息损耗，须建立一套源语 - 译语信息分析体系。本研究借鉴信息及信息结构理论研究成果，建立包含源语信息衡量体系与译语信息损耗评估体系在内的同声传译信息分析体系。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选取、转写职业译员国际会议英汉同声传译现场语料，按照同声传译信息分析体系对语料进行标注，建立英汉职业译员国际会议同声传译平行语料库（以下简称“英汉同声传译平行语料库”），基于该语料库对信息损耗类型、频次等进行描述性统计，管窥我国职业译员英汉同声传译信息损耗现况。

在描述性研究之后，通过基于语料库的文本和录音分析、语料现场分析与译员回溯性访谈等方法，解释英汉同声传译信息损耗原因和机制。

综上，本研究将回答以下问题：

- 1) 如何评估同声传译中的信息损耗？
- 2) 英汉同声传译信息损耗现况如何？
- 3) 英汉同声传译信息损耗原因和机制有哪些？

1.2.3 研究价值

在国际口译界，口译实践、教学与研究三者历来相互促进，不可分割：口译教师多由职业译员担任，口译研究多由职业译员开展。同声传译是技能性较强、复杂度较高的一种口译实践活动，也是口译教育体系中比较重要的一个专业方向 and 一类课程，还是口译研究中举足轻重的一个研究方向。本研究缘起于笔者的同声传译实践及教学实践，通过文献梳理与述评、理论建构、语料库建设、数据统计、语料分析，来回馈实践、教学，并拓展和深化相关研究。

实践方面。首先，建立一套同声传译信息分析体系，将同声传译译语内容评估从词汇-语义评估模式推进到信息评估模式，有助于更科学、有效地评估同声传译质量。其次，通过对多名职业译员现场语料的描述性研究，尝试回答同声传译能够译出多少信息——这一业界一直比较关心却鲜有研究的老问题，并以此管窥目前我国英汉同声传译质量水平，促进同声传译行业的健康发展。再次，通过多种研究方法分析译员翻译过程和产品，揭示信息损耗原因和机制，有助于译员增强同声传译中的信息传递意识，采取相应措施防范或减少信息损耗发生，提高业务能力和翻译质量。

教学方面。首先，基于职业译员现场同声传译语料的研究，展现同声传译真实工作情景和素材，呈现翻译过程挑战，有助于深化师生对同声传译工作特殊性、实践性、技能性的认识，提高教学针对性。其次，信息损耗评估体系有助于教学机构更好地开展入学选拔、课堂教学、毕业考试等环节中的翻译质量评估，也有助于学生练习过程中的自我评估。再次，信息损耗现状及损耗原因和机制研究的发现可以启示与指导同声传译具体教学过程。

研究方面。本研究有助于促进和深化我国同声传译产品与过程实证研究。首先，将信息结构理论等研究成果引入译语质量分析，建立同声传译信息分析体系，有助于促进同声传译译语质量评估研究乃至整个同声传译产品与过程研究。其次，由职业译员开展研究，聚焦英汉同声传译产品与过程，描述性研究与解释性研究相结合，语料分析与译员访谈相结合，量化分析与质性分析相结合，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目前我国同声传译研究方法单一、实证研究不足、职业译员开展研究较少、跨学科同声传译产品与过程深度研究缺乏的局面。再

次, 选取、转写、标注职业译员同声传译现场语料, 建设英汉同声传译平行语料库, 并进行基于语料库的量化和质性分析, 可为我国英汉同声传译语料库建设及基于语料库的同声传译研究积累一定经验。

1.2.4 研究体系

本研究是描述性研究与解释性研究相结合、翻译产品研究与翻译过程研究相结合、量化分析与质性分析相结合、语料分析与译员访谈相结合的跨学科实证研究。首先, 针对现有内容对应评估方法的不足, 通过对信息、话语信息及信息结构研究有关成果的梳理与借鉴, 结合同声传译工作方式特征, 建立包含源语信息衡量体系与译语信息损耗评估体系在内的同声传译信息分析体系。随后, 以该体系为标准, 对翻译产品进行描述性研究。选取和转写职业译员现场同声传译语料, 按照信息分析体系对源语及译语语料进行标注, 建成英汉同声传译平行语料库。基于语料库对信息损耗类型、频次等进行描述性统计。最后, 对翻译过程进行解释性研究, 以基于语料库的量化和质性分析、语料现场分析与译员回溯性访谈为方法, 以认知心理学、心理语言学及认知语用学为视角, 解释信息损耗原因及机制。本研究的体系如图 1.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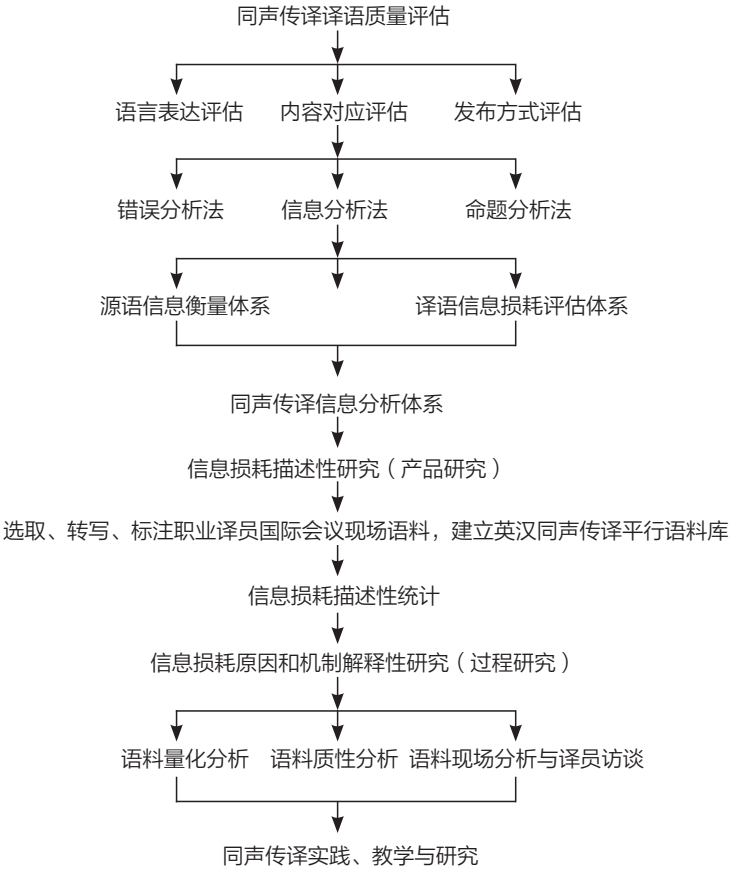


图 1.1 研究体系